

新旗

第十六期

實售國幣一千二百元

『五四』『五卅』結合起來

鳳岡

今年的『五四』過得相當熱鬧，尤其在北平上海，各學校各文化團體都有了紀念。舊的口號聯繫着新的運動，青年人表現了新的生氣，悶死人的局面逼他們走上戰鬥的路。

青年人自己喊着，中年與老年的過來人也這樣說着：新的『五四』在來了！

對的，牠在來；好的，我們歡迎牠來。不過我們必須馬上指出，正在來的不會是『五四』的重演，而將是『五四』與『五卅』的結合。

『五四』，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來是作為一個『民主』與『科學』的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是中國的『啓蒙運動』，總之，牠是一次充分表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精神的運動，牠是幾乎純粹以小資產階級為主力的。

六年以後有了『五卅』，這運動中仍然有着廣大學生的參加；但主力已經不再是學生，而是新興的與更堅實的無產階級了。戰鬥的口號也不再是『民主』與『科學』而是『反帝』與『生活』了，罷工的狂潮掩蓋了學生們的罷課呼號。

『五卅』給中國直接引入了一個革命時代，這革命本可以完成『五四』與『五卅』所提出的任務的；但因為史大林一系的破產領導，羣衆的流血換得了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凱旋。因此，不但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與保證中國工農大眾的生活，而且連民主與科學的實現都變成泡影了。

因此中國還有新『五四』的客觀需要。但是歷史是能重演而不能重演的。中國新『五四』與新『五卅』之間不但不會有六年距離，甚至

連任何時距也不會有哩。今後，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以主力資格踏進政治舞台，則學生的囑囑終於不過是嚷嚷而已，連舊『五四』的規模都不會有的。

前進與清醒的學生領袖必須正視着這一點。

新的『五四』不能與新的『五卅』分開，前者祇能因後者之到來而到來。爲要促成新的『五卅』，預備做新『五四』運動主力的學生們，必須將自己的全部心力從『文藝』的狹隘的圈子中跳出來，跑向工人，接近他們，喚呼他們，同時向他們學習，同他們鍛鍊，共同奮鬥，以便大踏步走向社會主義性的大革命。

中國現在正走向一個新的『五卅』，僅僅在這中間包含着新的『五四』。

學生應該和工人首先攜起手來！

第十六期目錄

- 『五四』『五卅』結合起來..... 鳳岡
- 工人自編生活指數，工資不打折扣！振蘇聯有反動的設施，我們也要反對！..... 木君
- 我們的政治主張..... 本社
- 時局與革命黨..... 鳳岡
- 我們要『制憲會議』..... 穆德
- 『聯合政府』問題答客問（下）..... 三男
- 是誰殺死了托洛次基？..... 蘭因
- 國際門爭
- 托洛次基派在朝鮮..... 盛
- 駐防東歐的蘇聯軍隊逃亡了很多..... 盛
- 日本戰俘不肯被人利用去破壞罷工..... 盛
- 印度托派爲印度共產黨受迫害事向政府抗議..... 盛
- 美國托派統一進行順利..... 盛
- 越南政府感謝美國托派援助..... 盛

發行所：新旗社
通訊處：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工人自編生活指數

資不打折扣！

振聲

生活比任何東西更有力量，牠很快而且很容易，打破了統治者及其走狗們的一切牢籠。

自從去年七月以來，國民黨的工運特務全面控制了上海的工人階級。這事實使國民黨當局安了心，放手從事反動事業，實施種種壓迫措施。其中最無恥與最公開的一項，就是凍結生活指數。

實施以來，工人階級確是敢怒而不敢言，於是內戰的全部負擔落在工資階級與薪給階級的肩上了。國民黨滿想就此可以解救『國家』的經濟危機。

但目前情形是這樣：即使工人統統變成了無報償的奴隸，或不吃飯的機器，國民黨的經濟還是沒有辦法的。因此，四月份起，由糧食領導，一次新的狂漲風起來了，一下子打擊到勞動者的肚皮。工資凍不住了。羣衆情緒十分緊張，控制工人的工官也沒有辦法。結果是用欺騙來代替高壓。在『五一』遊行中，『解凍生活指數』的口號居然也被正式提出來了，以此來企圖保持羣衆對工官們的幻想。

最初，工官們祇想讓羣衆喊喊，發洩發洩他們的怨氣；但事關肚子，光發洩解決不了問題，羣衆要認真解凍生活指數哩。於是他們又不得不玩花槍，施詭計。

經過了多少反動專家的設計，辦法來了，解凍生活指數，但逐級打折扣。這裏有一個最大的陰謀，就是分化工人階級。三十元以下的覺得可以滿足了，他們會退出戰鬥，而三十元以上的，人數逐層減少，而且逐層保守，這下子讓你們再也鬧不起事來。

此外，當然還有一張王牌拿在政府手裏：指數

由我編，誰也管不了我！結果，自然，解凍跟不解凍沒有兩樣。

這法兒要得固然妙呀！但牠能不能消弭生活指數鬥爭於無形呢？不，不，決計不。

因爲生活比任何東西更有力量，牠很快而且很容易，會揭穿統治者及其走狗們的一切欺騙。

『解凍了』生活指數仍舊不能讓工人吃飽肚皮，鬥爭還要繼續的。我們已經聽見聲音了，那是：『自編指數，不打折扣！』『反對有條件解凍生活指數！』

我們堅決擁護這些個口號。

蘇聯有反動的設施，我們也要反對

木君

中國與蘇聯不好比，是十分不同的兩種國家。中國是受資產階級軍事專制統治的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蘇聯呢，雖然也是在一個極端野蠻的官僚統治之下，却總是由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立下了基礎的，所以在根本的財產關係上，總還是比較進步些，牠不但比中國，甚至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來得進步。

但我們與史大林主義者不同，我們決不盲目地歌頌蘇聯的一切，尤其不歌頌牠的野蠻與墮落的官僚，以及他們的一切政策設施；我們非但不歌頌，而且竭力反對，竭力要打倒，我們認爲替這些官僚的反動措施辯護，就是反對蘇聯。

可是史大林主義者及其一切同情者不然。在他們，蘇聯就是史大林官僚，擁護蘇聯就應擁護史大林，所以他們以爲史大林官僚的所行所爲，無一不是好的。

蘇聯要實行男女分校了，『好的』，他們曲意

辯護；可是國民黨也想實行這個辦法，那是壞的，他們懂得了。

他們決不肯說蘇聯這辦法也是反動的。

現在，全國大學生爲公費的增加與擴大而罷課，這當然是對的，好的，史大林主義者都贊成，我們也贊成。

但是自從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蘇聯公佈了一個法令，『技術學校學生每年須付一百五十至二百盧布的學費，大學學生應付三百至五百個盧布的學費』，因此法令之故，六十萬貧苦學生失了學。這辦法，我們說壞的，反動的，他表示着史大林官僚的更加墮落，可是我們的史大林主義者及其同情者，對此將作何辯解呢？當然說這是好的囉，因爲在他們，史大林的一切辦法都沒有話講。

一切爲公費在奮鬥的中國學生，應該想一想蘇聯取消公費這個事實，復由此小事去認識史大林黨的墮落與欺騙。

中國統治者的壞事應該反對，可是蘇聯統治者的壞事也不應該贊成呀！

老手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工人被屠殺，劊子們說，是爲了工人內訌，軍隊去維持秩序，才把糾察隊繳械的，其實是一些便衣份子先向工人進攻，正規軍隊隨後跟了來。這件事，劊子手們以後並不隱諱。今天，雖然經過二十年了，但我們在上海各學校罷課中，還看見這老手法在應用着。人們要毆打學生，要逮捕學生，但還不敢彰明較著地做，還是先製造學生『內訌』，再來施行壓迫。這手段是更卑鄙些！

我們的政治主張

時局與革命黨

鳳岡

(一)立即停止內戰：——反對國民黨勾結美國帝國主義討伐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武裝隊，反對徵糧，徵稅，徵兵！

(二)澈底改善與保障工人生活：——按生活指數十足發給工資；職工代表自編生活指數；八小時工作制；工會領導機關民主化；反對國民黨棍控制工會；工人管理前敵偽工廠；工人監督『國家銀行』與『國營事業』；救濟失業；確保罷工權；取消一切反對勞動者的法律！

(三)沒收土地歸貧農：——切實沒收地主與富農土地，由全體自耕農，貧農與僱農組織土地委員會加以管理，由各成員分種或集體耕種；打倒高利貸；取消一切苛捐雜稅！

(四)軍隊民主化：——一切軍隊（不分國共）立即成立兵士委員會；徹底改善兵士生活；廢止一切等級，特權，壓迫與侮辱；革斥全體反動軍官；兵士自選指揮員；授退伍兵士以土地；廢止常備軍；由工會編練工農民軍！

(五)保障貧民生活：——成立各類消費者代表會，規定日用品價格，監督一切經濟活動，懲罰投機囤積；成立住戶聯合會，分配一切房屋；由國庫廣建房屋，交工會與住戶聯合會支配；清算並沒收大官僚，一切發國難財，勝利財與內戰財者的財產，用以整理幣制，安定物價，興建工廠，由工人管理，以此切實救濟貧民；以單一

幾個世紀遺傳下來的社會矛盾，尤其從內戰及其後果經濟恐慌所激起的社會不安，很顯然地表示出，中國當前的局勢是十分嚴重了。這局勢能導引出什麼『大事』？將如何發展？能否引起新的中國革命？現在還不能預言。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就是這些社會不安決不會毫無影響地過去，不會在當局者幾句威嚇之前消滅，牠們會發展，會繼續，即使停頓而其影響仍能擴大，雖趨平靜而其潛力仍會奔流的。

總之，現在是處在一大動亂的前夕，雖然這動亂之突發，持續，規模與影響是難於預言。在大約一年之前，我們就指出過，就客觀的或潛在的形勢說，中國簡直和一九一七年前前的俄國相差不遠。『和平，糧食，土地』，成了最大多數人的最迫切要求。一年來，情形更嚴重了，而方向仍是一樣的。人們迫切地需要『和平，糧食與土地』，只是其迫切性已比一年前增大至無限倍了。全國戰亂，遍地飢荒，使一九一七年俄國的老口號成了一九四七年中國民眾最現實的要求。跟過去一切大時代的來臨一樣，學生首先代表了全體民眾，將他們不敢喊或不能喊的要求喊出來了。現在學生們所喊的雖然還不是『和平，糧食與土地』，但是本質上是反映着的。在政治覺醒較高的北平學生們，『反內戰』口號已經公然喊出來，而各地學生的『增加副食費』運動，則不過是『糧食與土地』要求之表現於學生生活罷了。

『和平，糧食與土地』這口號，曾經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引起了世界史上一次頂頂偉大的革命，造成了第一個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故事。如今在中國，這同樣的要求能否造成同樣的故事呢？我們在一年前提出過這個問題，現在又要提出這個問題。

從事變的客觀進展說，現在，我們可以比一年前更加確定地回答這問題：能夠的，能夠的，能夠造成的。不錯，目前的『不安』還主要由學生發動着。廣大的民眾懷着同情，彷彿站在這門爭之外。但我們切莫忽略了，工人階級為生活指數凍凍的鬥爭，雖然一時受着欺騙而略趨平靜，但仍將隨時勃發為怒潮的；至於貧苦農民的土地鬥爭，那末在史大林黨的領導（正確些說，應該說控制）之下，正發展成生死的搏鬥。此種小資產階級的，貧農的與工人的鬥爭，勢將連結在一起。而一旦連結，這便是革命了。

現在為什麼還不連結呢？客觀上說，由於國民黨反動的壓迫機構還沒有瓦解，而這個機構之所以尚未趨向瓦解，則主要因為兵士還受着紀律束縛，還沒有能對學生，貧農與工人的要求公開同情。可是學生的叫喊，工人的罷工，與貧農的鬥爭，却遲早能使被強迫穿上軍服的貧農們，也在『和平，糧食與土地』的口號之下行動起來。兵士們一旦也公開反對內戰，一旦也要求增加『副食費』，一旦也要求土地，那便是暴動的局勢了。便是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二月局勢了。

所以從客觀的事件進展說，中國目前的『和平，糧食，土地』的運動，一定也能够造成俄國式革命的。自然，沒有一個人會斷定，以為中國行將亦步亦趨重走一九一七年俄國道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會延遲，推緩與改變此類事變的過程。不過我們毋須過分憂慮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阻礙作

的財產累進稅代替一切捐稅；革斥一切貪官污吏，官吏民選！

(六)保障青年的求學與就業：——增加教育經費；大學生一律公費；實施普及的義務教育；反對黨化教育；保障教師生活與學生營養；反對男女分校；畢業學生有充分就業機會！

(七)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工，糾察完全自由：——立即取消一切特務組織；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立即廢除保甲制和警管區制；切實保障各種自由！

(八)保證中國民族之對外獨立與對內自治：——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中國政；反對美軍駐華；取消中美新不平等條約；否認一切外債；實行自主的保護關稅；沒收外商在華產業；讓台灣人自治；保證國內諸小民族的完全平等與自治！

(九)保衛蘇聯，打倒史大林官僚政策：——反對作美國帝國主義貓爪進攻蘇聯；反對恢復沙俄特權的『中蘇條約』！

(十)與全世界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撤退一切佔領軍；反對鎮壓殖民地獨立運動！

(十一)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取消一黨欽定的憲法；取消一黨政府；反對各黨派上層談判改組政府；反對領袖協商的『聯合政府』；主張由全體人民以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產生工農政府，實行上列政綱。

一九四七年五月

用，不必過分担心的，因為美國自己也孕藏着深刻的革命危機。太多的因素將造成這個現今最強大國家的內部『社會不安』，我們中國能起革命，也將是一個有力因素，去促成美國革命的。而美國這個十分現實的革命危機，將有力地幫助着中國走上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道路，或幫助我們鞏固革命勝利。

由此可知，目前正在開展着的中國局勢，在客觀上，頗有勝利地走上革命的可能。那末主觀方面怎麼樣呢？換句話說，如果革命真像我們所預料地來到了，那末現在中國的既存政黨中，可有一個能出來領導牠，使牠走上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之路，而建立社會主義性的無產階級政權嗎？不幸，我們不得不坦白地說：現在還沒有這樣一個政黨！

我們知道，如果沒有布爾雪維克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雖有十分順利的革命局勢，也絕對不會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為祇有布爾雪維克黨，牠堅決地站在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與現實利益上，堅決地實行階級政策，堅決地反對『聯合政府』，堅決地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綱，堅決地爲無產階級的專政而鬥爭，才能够完成了革命，才能够建立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工人國家。

現在中國有這樣的黨嗎？沒有，沒有。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全民的』，牠主張『階級合作』，主張『聯合政府』，反對徹底土地革命，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一個黨，相等於俄國革命中的社會革命黨，即克倫斯基的黨，牠祇能斷送革命，絕不能完成革命。

『青年黨』，『民社黨』，『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等等怎麼樣呢？那更不必說起了，這些都不過是些資產階級的政客集團，牠們大多是革命的對象，根本談不到領導革命的。

餘下來，只有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托派），即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了，這個團體，在理論與政綱上說，確乎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黨，確乎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雪維克黨的傳統繼承者。牠在政治上有資格領導這未來革命的。但同時我們必須指明，這個唯一革命的黨，至今還不會有廣大的工人羣衆的基礎。沒有廣大羣衆，即使是最正確的革命黨，也不能發生決定作用的呀。

因之，中國目前乃至今後局勢的一個主觀上的大關鍵，就是要賦中國托派政黨以廣大的羣衆基礎。一切願意爲未來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的人們，應該快快加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藉以保證今後局勢的順利開展！

五月十八日

新書出版

中國革命問題

托洛次基著
凡西校譯

新旗叢書之一 春燕出版社印行

實價二萬五千元

本書包括托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之全部論文，書信與談話。起自一九二七年二月，迄於一九四〇年七月。舉凡中國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政治鬥爭，以及中國之前途等等，均有精詳分析與正確指示。不僅爲一革命的共產主義者所必備，抑且爲留心中國近代史之人士所應讀。譯者爲便利中國讀者起見，對於重要名詞及史實均加有詳細註釋。卷首復附一序文，概括介紹托氏思想特點及其發展。全書共五十萬字。

我們要『制憲會議』

穆德

今年秋天，國民黨訓政政府，或國青民三黨共同訓政政府，要在中國舉行一次『普選』，來選舉國民會議代表了。這『普選』是否能夠舉行，即使舉行，選出的代表是否開得成國民會議，現在都不能確說。那是須看從今開始的一個時期內的事變如何，來決定的，而從今開始的一個時期將是富於大事變的時期。但雖如此，革命的工農大眾及其領導的黨，對於準備選舉的國民會議，不能不有一個確定的立場，現在就應當有一個確定的立場。

據政府說，未來的國民會議是依照去年通過的憲法規定而選舉的，牠將依照此憲法規定去實行牠的職權。換一句話說，牠將是『行憲的』國民會議，以別於去年召集的那個『制憲的』國民會議。

整個問題就在於：去年那個制憲的國民會議能代表全國民意麼？牠制成的憲法得到全國人民公認了麼？依照這個憲法規定能夠解決中國問題麼？

大家知道，去年那個國民會議并不能代表全國民意，因為大多數代表是在一黨專政之下產生的，而且產生於十年以前，即戰爭尚未爆發以前；臨開會時雖然添加了若干屬於青年黨和民社黨的代表，但這些代表仍然不能代表民意，仍然是由那兩個黨提出而非民衆選出的。如此產生的國民會議，即使制成了一部十全十美的憲法，全國人民仍不能認爲是自己的憲法，何況制成的只是以五五憲草爲底本，再採取若干政協通過的原則呢？五五憲草固然不能解決中國問題，政協原則即使全部採取在憲法之內，也仍舊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憲法頒佈時，民衆態度底冷淡，憲法頒佈後，內戰更加劇烈，經濟更加混亂，政治更加無出路，以至現在，民衆幾乎忘記了有去年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憲法那一回事，——這一切就是明白指示：中國現在需要的，還不是甚麼行憲的國民會議，而仍是一個制憲的國民會議。

中國一切根本問題，一切最最根本的問題，需要拿出來，讓全國民衆，尤其佔全人口中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直接選舉代表組成國民會議來解決。中國應當採取甚麼社會制度，應當實行甚麼政治形式，祇有這樣一個國民會議才能決定。一切現存的權力機關，都需服從這樣一個國民會議，都需經過這樣一個國民會議重新認可才能享有權力。這是享有最高權的國民會議，這是名副其實的『制憲會議』。

『制憲會議』是資產階級革命中新創的武器，當初資產階級曾經使用這個

武器推翻了中古封建制度，而建立近代資本主義制度。

現在，歷史發展已經達到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了，可是『制憲會議』，這個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使用的武器，仍然保有其革命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僅落後的國家，如印度，在召開『制憲會議』來表示全國民衆底意志哩，而且先進的國家，如法意諸國，民衆意志仍在借『制憲會議』形式表達出來。

在中國，我們現在也仍需經過『制憲會議』來表達全國民衆意志。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甚麼行憲的國民會議，不是甚麼一般空泛的，意義含糊的國民會議或國民大會，而是『制憲會議』。

現在，當國民黨御用的國民會議召開而又頒佈了憲法以後，當共產黨和民主同盟聲明否認此國民會議和此憲法的時候，當廣大民衆對此亦表示厭惡和冷淡的時候，當制憲的國民會議和行憲的國民會議糾纏不清的時候，我們拿『制憲會議』口號來代替過去的『國民會議』口號，是有革命意義的，因爲這個口號意義是明白而確定的，而且是現在世界諸重要國家所通用的。

可是，無論用『制憲會議』口號，或『國民會議』口號，我們都不要忘記：最後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這『會議』自身，並不是這『會議』以內的人物和議案，而是這『會議』以外的羣衆行動。不僅現在，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是這樣；以前，在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也是這樣。歷史上最民主的『制憲會議』，即法國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三年兩次召集的『會議』，仍須挨受外面羣衆行動底鞭策，才能走上革命道路。所以，我們爲『制憲會議』而鬥爭時，更需要羣衆運動底加強和擴大，更需要議會外的行動來影響議會內的決定。我們要『制憲會議』，要用直接無記名投票普選出來的握有全國最高權的『制憲會議』，一切現存的權力機關都應服從『制憲會議』。我們不要甚麼行憲的國民會議。

我們不要一黨專政所制成的憲法，我們也不要黨派協商所制成的憲法，我們不要『制憲會議』召開以前任何人所起草的憲法。我們要『制憲會議』不受一切舊拘束而新制憲法，我們要『制憲會議』特設憲草委員會來重新起草憲法！最先的和最重要的，我們要一部民主的選舉法來選舉『制憲會議』，在此選舉當中必須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完全的自由權！

「聯合政府」問題答客問(下)

三男

問：關於「聯合政府」，上次經你解答以後，已經祛除了我許多成見與誤會，我相信，就理論說，你們在這問題上是站得穩的。不過我想了幾天總覺得，你們的意見是太空了，太理論了，事實上並不一定像你所說的。「聯合政府」並不一定像你指出的那樣要不得。首先，還是讓我們談中國吧，目前的中共，比你前次講的武漢時代的中共，力量上是大大不同了。牠現在擁有這麼多與這麼強的軍隊，難道不能保證牠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難道不能保證牠的政綱一一實現出來，難道不能保證這個「聯合政府」逐漸走到革命的工農政府嗎？

答：這裏我第一要指出你的一個錯誤見解，其實不僅是你的，而是一般人的一個錯誤見解。這見解把「理論」與「事實」對立起來，完全分離開來。結果是否定了理論，僅僅看到事實。這是不對的，而用以談革命則是危險的，致命的。中國人講革命，普通總祇了解成「招兵買馬」，或「揭竿起義」，是無所謂理論的。理論，在一般人腦子裏就是讀書，或書本知識，而讀書的人就是書獃子，就是「秀才」；書本知識是與「事實」不符的，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是老話，也是中國人的成見，這成見一直傳下來，竟還牢牢地握住了大多數前進份子的思想。這是十分不幸的。

其實時代完全不同了。現在，當這階級鬥爭十分劇烈，十分複雜的時候，要想在這混亂局勢中找到一條出路，要想使被壓迫的人羣與被剝削的階級革命成功，非首先了解客觀環境

，明瞭主觀任務，並接受與溶化至少一兩百年來革命經驗不可。要做到這一步，則非學習理論不可。簡單的「幹」，簡單的「招兵買馬」，這祇能在封建社會中資產階級起來推翻貴族時候可以辦到。因為他們畢竟是相通的階級，而那些「古典」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也比較的小，同時起來革命的資產階級，早在社會的各方面成爲半統治階級了。這時候，革命還不需要成爲「職業」，即是說，爲了革命尚不需要好多終生從事於革命的人，革命尚未變成極複雜的課題，也因之沒有產生專門的革命理論的必要。但一到十九世紀中葉，歷史提出了一個新的革命要求，要求那愚闇，不文，最受壓迫的無產階級「翻身來」，推翻那個有教養的與文明的統治階級——貴族與資產階級。不僅要在政治上推翻牠，而且要在整個社會制度上來一個根本變革。爲了完成這個革命，我們不能希望那個愚闇不文被壓到地的無產階級，整個而自發地行動起來呢？顯然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就客觀的歷史條件分析，就牠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地位說，固然是最革命的，是「歷史使命的負擔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主力。但這一切，決不能叫我們忽略一個事實，就是這個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知識或文明的程度講，始終是落後的。最大多數的工人都不能自覺到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此種革命之必要。更不必說此種革命之步驟與做法了。於是乎需要有一先鋒隊，需要有一小部分工人乃至非工人份子，窮畢生之力，以

革命爲業，研究革命之道。這裏的所謂「革命之道」，就是理論。如果沒有這個理論，沒有依據這個理論而團結一部革命家來從事革命，讓他們在平時，在各種艱苦的環境之下，依據於正確而明瞭的理論而行動，由此準備革命，并爲革命而準備，那末，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是永遠不能成功的。

一百年來，所貴乎有馬克思以及一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家者，原因即在於此。同時，在一百年來的工人革命運動史中，凡忠實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革命者必看重理論，而一切墮落成資產階級政客的社會主義者，則總是從輕視理論開始，從理論與事實的根本對立開始，其故亦在於此。列寧是最能行動，最懂得「事實」的人，但他恰恰是最看重理論的。在列寧看來，「理論乃是行動的指導」。

現在我要說回來了。對於托派，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曾經有過一個流行的批評，那就是：「托派祇會談理論」。這話假使指的是托派祇談理論不專行動，那我們不屑同他辯論，因爲這不是事實。假使這話也像你所说一樣，即：理論站得穩而事實不然，那末我必須告訴你：凡是理論正確的，決不會在事實上錯誤。反之，一個正確的行動，決不會在理論上站不穩的。如果你承認中共的「聯合政府」政策在理論上站不穩，你便無法說牠在事實上正確了。

問：我的一句話引出了你一篇大道理。我承認，理論與事實，或理論與行動無法對立。也許我上面的話有點語病。不過這且不談，你還是接下去，答覆我，中共的武力能否給牠的「聯合政府」以一個有利的，或革命的保證？

上面說了這許多話，就爲了要答覆你這個問題，因爲我現在仍只能在理論上答覆你提出的『事實』問題。現在你假使真已承認理論不能與事實對立，那末我希望我解答了你的事實問題之後，如果你在理論上認爲正確，便不應該再在『事實』上找遁辭了。

首先我承認，武力自然是革命政黨的一個力量。但你得知道，武力本身只是一個工具。牠不是萬能的，不是基本的。一個革命政黨的主要力量乃是牠的正確的政綱，即符合於無產階級及其革命利益的政綱。武力，祇當牠替一個革命政綱服務的時候，才能發揮出革命力量來。否則，縱使牠不替反動服務，至少也是沒有出路的。中國歷史上充滿了『招兵買馬』式的『革命』，也充滿了『以暴易暴』式的朝代變革，這在一方面固然說明着中國數千年來祇有走馬燈式的循環；另一方面也將一個思想深深地印進了中國人的腦子：祇叫有了武力就能『革命』。這思想不但擒住了孫中山，而且也沒有放過毛澤東。『有了兵就有一切』，這成了中國一切『有大志者』的信條，其實這是錯的，至少已犯了時代錯誤病了。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武力首先是政治性的與階級性的。換句話說，一支武力的造成，必須以明確的政綱爲基礎，且以革命階級分子爲骨幹。如果離開了政治，離開了階級，那末武力總歸是統治階級與有產階級的工具，因之是反動階級的工具。

現在我們可以看中共的武力了。牠是以什麼政綱作基礎，以什麼階級作骨幹而組成的？很明顯，牠是以階級合作綱領做基礎，主要以農民分子組成的。中共的領袖們自己不隱諱，

公開地對他們的軍隊說：你們是爲一個包括『自由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等等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而戰，你們應該爲這個『共同要求』而戰，如果工農與『資產階級及紳士』利益發生衝突之時，你們決『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四十一頁）試問，在這樣的綱領上形成起來的軍隊，同時這軍隊中差不多所有的成員都是小有產者的農民，你能希望牠在『聯合政府』實現之後，『保證這政府逐漸走到革命的工農政府』嗎？

誠然，中共目前並不要拿自己的武力來保證『走向工農政府』，這在他們是認爲未來的與遙遠的事。他們現在需要保證的，正是你說過的前面兩種：即共產黨人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民主政綱』的實現。現在就讓我們來談這兩個『保證』吧。照目前的『事實』看來，中共的武力甚至連領袖們在『聯合政府』中的部長地位都沒有給保證到。不過當然，這是條件問題。即中共的要求未能爲國民黨所接受之故。所以僅僅談『聯合政府』中的地位，那末當然能够保證到的。而且我們不妨假定，國民黨終於接受了中共的要求，成立了『聯合政府』，在那政府中，中共自然與現在的青年黨與民社黨不同，占了更多與更重要的席次。但到了那個時候，因爲政府已經『民主化』，已經根據於一個『統一的施政綱領』，軍隊自然也要『國家化』了。共產黨軍隊由於其據以組成的政綱使然，也確實沒有足以與國民黨立異的地方了。這些軍隊於是被逼或自願地改編爲『國家軍隊』。這時候，中共的農民軍隊，當然把『聯合政府』看作自己的政

府，雖然事實上這還是資本家與地主的政府。他們對政府的敵視心沒有了，軍隊上層呢？因爲愈加接近政府機構，愈加過着特權階級的豪華生活，也就愈加與『自由資產階級』及『開明紳士』妥協了，變成一家人了。久而久之，甚至在不長的時期內，共產黨武力，如果不被消滅，就會徹底墮落的，而共產黨人的部長們，如果不完全屈服，就會被踢出來的。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的『聯合政府』路線，使牠的武力不但不能保證『民主政綱』之實現，甚至不能保證共產黨人長期留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哩——當然，共產黨人如果完全投降，則又當別論。

問：你未免將前途設想得太簡單了。共產黨不會這樣愚蠢的，他們不會在『聯合政府』初初成立，『施政綱領』未曾兌現之時，就讓自己的軍隊被『整編』的。他們一定要緊緊抓住這個力量，迫使政府將『民主政綱』實現。

答：事實證明，中共武力不被『整編』，國民黨決不肯接受『聯合政府』。同時國民黨爲了叫共產黨軍隊『國家化』，某些民主姿態一定會做出來，至少在一個短期間，甚至做一些類似實現『民主綱領』的事情也很可能。這一切都爲了叫中共交出兵權。這時候中共交出軍隊呢？交出吧，這個『聯合政府』的『民主姿態』顯然是靠不住的；不交出吧，那末一方面因爲操縱着『國家』的名與實的國民黨的壓力，另一方面因爲中共自己所標榜的『聯合政府』綱領，很不容易辦到。結果，多半當然要爲了這個『聯合政府』的造成或延緩而交出來的。不過在這裏我還可以退一步，假定國民黨答應中共保持武力而參加『聯合政府』，甚至更假定

，這支軍隊仍能由中共單獨控制與訓練，這樣是否給了中共以必需的保證呢？仍舊不，因為祇叫中國共產黨的政綱是爲了『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爲了『調節中國各階級的利益』，那末這支農民軍隊（即使將來參加進一些工人分子也還是一樣）必然要變成資產階級與地主反動工具。你必須知道，一個以發展資本主義自任的黨決不能成爲真正共產黨，同時一個以調節階級利益爲目的的黨也決不能造成或維持一支爲工農階級利益而戰的軍隊。軍隊是政治性的，是階級性的，什麼政綱造成什麼軍隊，什麼階級造成什麼軍隊，這中間絲毫假借不得。在這裏，理論是勝過事實的，理論一定會給你證明出事實來。

問：中國，因爲『聯合政府』沒有成功，所以上面所說的只是理論，只是揣測；不過在法國，這些都是事實……

答：且慢，我還要談中國。依你之見，中共不是應該放棄『聯合政府』要求，憑着武力，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嗎？憑着武力，一心一意繼續內戰，去爲工農政府鬥爭嗎？

答：也不盡然。中共假使能够拋棄與資產階級國民黨組政府的幻想，自然是好的。倘能揭起旗幟，爲中國的工農政府之建立而鬥爭，那更是好的。但爲了這些，僅憑農民的武力完全不够。農民不是一個階級，牠是好多階級組成的一羣，其中包含着資產階級的富農，小資產階級的中農與貧農，以及半無產階級的僱農。所以農民是不能起一個獨立的政治作用的，不能先天地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農民的鬥爭，從來不是爲了社會主義，而是爲了自己想私有土地。因之，農民的武力，如果沒

有城市工人堅強的政治鬥爭所領導，終於墮落而爲資產階級所利用的。換句話說，農民的武力，祇能是工人階級可能的同盟軍，而絕不能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力，不能爲工農政府之建立而鬥爭。所以照我們托洛次基主義者的意思，中共目前應該放棄的不但是『聯合政府』的政策，而且又是單靠農民武力的幻想。他們如果真想完成中國革命，那末他們應該在放棄目前這點武力的條件之下，努力把主要的活動移轉到城市，將基礎建築在無產階級身上，配合着工農的鬥爭，爲一個普選全權代替國民黨獨裁的制憲會議而作戰。

問：那末中共爲什麼不像你說地做呢？

答：這問題說來話長，此地不能詳細回答。不過有一點必須在此地指出的，就是：有些人以爲一個政黨的政策，在任何時候與任何條件下，都可以隨少數領袖們的意思而任意更換，那是錯的。我說這話，自然並不否認領袖們的作用。我承認，在有些時候，領袖的賢明領導乃是一個革命黨能採取正確政策的重要條件。但這祇當某些時候，正確些說，祇當某些條件之下，才是如此的。什麼條件之下呢？即在有革命階級的羣衆基礎，健全的黨制，以及有獨立思想的革命幹部的時候。如果這個黨，曾經是革命的，但經過了一個深刻的墮落過程，以致第一，失去了原來代表的革命階級的羣衆，其次，爲少數官僚集團所把持，以致最後，幹部分子都換成了些諂媚下與唯命是聽的陞官發財主義者了，那末這個黨，再也不可能回返到真正革命的路上去。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本來是革命的工人黨，但從一九二三年後，因爲種種原因（這些原因我們也不能在此地講，如果你對牠

們有興趣，你可以找托洛次基寫的『自傳』，『蘇聯的現狀與前途』等書來讀），最早是蘇聯共產黨，後來則全國際的共產黨，都右傾了，使黨的政策走上了右傾的路，而右傾的政策，回過來又選擇了保守的幹部，決定了非革命的羣衆基礎。政策選擇人，人又選擇政策，如此往復，繼續了二十餘年，以致全世界的共產黨，都確定地爲極右的官僚化的保守分子所把持，確定地執行着極右的與資產階級相妥協的政策。現在你如果希望這樣的黨，能有一天忽然又回返到革命的正確路上來，那就等於相信奇跡。現在全世界的共產黨都走着『聯合政府』的路，這不是一時任意決定的策略，可以隨便更變的，不，牠乃是二十餘年來共產黨右傾與墮落的結果，是砍去了成千萬革命者的頭顱，出賣了十月革命傳統，並斷送了好多次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自然結果，這樣的結果是不能爲現在共產黨的任何一个領袖願意撇開的。

問：你這個解釋使我滿意。牠解消了我很久以來存在心中的一個觀念。我從來覺得共產黨即使有錯，牠一定會改變的，至少是可以改變的；現在經你一說，我彷彿對共產黨有了個新看法了。

答：不過有許多現象仍使我不解。好比你提起過的法國，尤其是東歐許多國家，在此次戰爭之後，先後成立了『聯合政府』，結果，在或多或少程度內，都實行了土地改革。你能說這些政府是反動的？能說牠們不會逐漸變成工農政府嗎？還有法國，『聯合政府』不也是起着明顯的進步作用嗎？因爲，如果法國共產黨不贊成『聯合政府』，中間派就要同戴高樂派攜手了，不是更壞嗎？

答：讓我們從東歐談起。不過東歐問題太大，也太

新；要把這些『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作一個多方面的研究，顯然不是我們這個談話所能做到，同時也不必做到，因為我們現在所關心的是『聯合政府』，所以重要的是要看『聯合政府』在這些國家中所起的作用。我們知道，當紅軍乘戰勝之威，長驅直入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國的時候，這些國家裏的舊的統治機構差不多都已經瓦解了。工農大眾蜂擁起來。許多大工業家與大地主逃跑了。工人佔領了工廠，武裝的民軍逮捕着舊官吏與合作分子，以直接行動肅清法西斯主義。工人委員會在許多地方發生，形成了蘇維埃政權的雛形。在好些地方，農民暴動起來，自己分取土地。這時候，進入這些國家的蘇聯當局只要能夠採取一個放任態度，工人便能成爲這些國家的真正主人的。可是史大林主義者並沒有放任，非但不放任，而且積極採行了壓制政策，更壞的，採取了搶劫政策。這些頭上繞着十月革命光圈的紅色元帥們，蘇維埃的黨政警人員們，一到了這些地方，便急不及待地和當地舊統治的垂危的代表人勾結，以無情的手段鎮壓工人，解散他們的委員會，繳除他們的武裝，逼令他們放棄一切直接行動得來的東西，好讓各國史大林黨與小地主的，資本家的及『農民』的政黨組織『聯合政府』。你看，所有這些政府都是撲滅了羣衆革命的結果，或者，牠們是爲撲滅羣衆暴動而組成的，難道我們還能說這些政府是爲了革命的利益的嗎？當這些『聯合政府』成立之後，不錯，史大林黨把一些搶剩下來的工廠『國有化』了，但是十分虛偽的，其實質和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差不多。（關於這，我們預備在『新旗』上作文詳論，這裏僅限於如此指出。）

此外，這些政府又實行了某種程度的土地改革。然而我們只要稍稍考察一下，就不難看出『聯合政府』如何限制了這些改革之深度與廣度了。第一，沒收標準是要看土地所有者是否與納粹合作；第二，地主拿出他『多餘的』土地（例如依匈牙利的標準，超過三百畝者爲多餘），能够收回代價；第三，富農的土地，祇叫他不是佃出地的，仍不在沒收之列。這樣的改革充分表明了牠的有利於資產階級，甚至也不十分損害了『愛國』地主們的利益。如此說來，由史大林黨做骨幹的『聯合政府』對工人既如彼，對農民又如此，無怪東歐諸國的工農，在一年以來，逐漸對共產黨冷淡，同時資產階級的與『農民的』政黨，則愈來愈採取攻勢，愈占據優勢了；這在好幾國（如匈牙利，波蘭等）選舉中，都可以看得出來。所以東歐這些國家的『聯合政府』，就其存在至今的作用說，也是反革命的，因為牠們用了改良的面貌，將工農的革命行爲欺騙下來，使驚惶而胆怯的資產階級壯了胆，穩住了統治，以便日後更進一步，靠了西方國家的力量來破壞『聯合』，實行反工農與反蘇聯的法西斯統治。

問：我覺得你這樣觀察與事實不盡相符。你知道，現在克里姆林宮是這些國家的全權統治者，各該國的『聯合政府』的主力是共產黨，其他黨派是邀請進去做花瓶的，有如我們中國的青年黨與民社黨一樣。東歐國家究竟該採取什麼制度，完全取決於克里姆林宮裏的巨頭們。史大林要牠們長就長，要牠們短就短。現在史大林沒有使這些國家變成『蘇維埃』制，並非不能夠，而是不願意；史大林要請這些資本家來『合作』並非因爲他們有力量，而是因爲他們可

利用。那末爲什麼不建立蘇維埃，爲什麼要利用舊統治者呢？照我看，那祇是爲了要敷衍英美帝國主義，不要過分刺激牠們，藉以取得時間，建設自己，等到將來攤牌。到那時，時機一旦成熟，那末史大林可以在任何一分鐘把這些『花瓶』丟開，有如搾乾了的檸檬一樣。所以我想，東歐這些『聯合政府』，不是反革命的，牠們對於各該國革命利益與蘇聯利益都有好處。

答：你這個論據提出得很好，因爲這些論據，乃是史大林主義者及其同情者爲『聯合政府』辯護的主要理由。就是說，當時機沒有成熟的時候，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利用資產階級，搾他們的汗水。史大林曾經把這個政策，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間，大規模地應用於中國，於國民黨，於蔣介石，於汪精衛，乃至目前，應用於什麼『民族資產階級』。他正是拿檸檬來打比的，他要『搾乾』蔣介石這只『檸檬』然後丟掉牠。但是用不着我說，你知道，那時候做了檸檬而被丟掉的不是蔣介石，也不是汪精衛，而是中國的共產黨，中國的工農大眾。

關於這個利用資產階級的破產政策，我不想在此多說，現在我介紹你一本書，即托洛茨基著的『中國革命問題』，在那裏你可以看到這個政策的整個作用與全部真相。此地我祇想告訴你一句話：凡是以損害工農利益作代價，企圖和資產階級聯合，由此『利用牠』，『搾乾牠』，則結果總是被利用，被搾乾，因之斷送了革命的利益的。關於這個簡單的道理，不但馬克思和列寧等革命導師充分地教訓了我們，並且百年來的真實革命鬥爭，也如此教訓了我們。史大林們的主要錯誤與罪惡，就在於他們

叛離了這個教訓。

此外我還要指出你幾個似是而非的事實與理由。第一，史大林的軍警勢力控制了東歐諸國是事實，但由此你若以為史大林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在那裏造成一些蘇維埃制的國家，却不盡然。首先我要問，什麼叫做蘇維埃國家呢？簡單的警治國家嗎？或者土地，工廠都收歸國有，推翻私人資本主義，但權力完全操在這些特權者手裏的國家嗎？或者，工人階級成爲經濟與政治二者的真實主人的一種國家嗎？若是第一種，當然，史大林現在就已在那些國家中造成了。若是第二種，那末，即使不在所有東歐國家，至少在某幾個，例如波蘭等，確實可以限日造成的。在波羅的海三小國中，史大林已經這樣做過了。不過，你的意思如果指的是第三類，那末史大林們既不能限日造成，也決不敢造成的。爲什麼？因爲要造成一個國家，其中由工人階級經過民主的蘇維埃機關，掌握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全權，那就非先經過一次從下而上的廣大羣衆的工農革命不可。這樣的革命，勢將發生無比的熱力，影響到各國，尤其影響到鄰國的蘇聯，使那裏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工農大衆興起，起來推翻僭竊革命政權的史大林官僚。因此我說，史大林是不能也不願造成這樣一些蘇維埃的東歐國家的。史大林所要在東歐各國鎮壓工農的羣衆鬥爭，請回資本家來組織『聯合政府』，首先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第二，我自然承認，對英美的顧慮，也使史大林採取了目前的策略；但若不爲這顧慮，史大林能採取什麼策略呢？至多不過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樣子吧了，即用純粹的警察手段取

消了私人資本的所有制。這辦法，在經濟的觀點上看我們即使可以承認是進步，但從蘇聯民主制的復興，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看，却並不是什麼進步的。還有，第三點，你說這些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政派始終只是些『花瓶』，等到時機成熟，要同英美帝國主義攤牌的時候，史大林可以一脚踢開，也是不對的。無論在這些國家中克里姆林宮的力量是多麼地強，多麼地直接，但這些資產階級在國內的社會關係中，以及國外的國際聯繫中，却是有力量的，而且因爲『聯合政府』之故，他們將愈過愈有力量的。所以時間愈過去，蘇聯的官僚主義墮落愈深刻，這些國家的羣衆愈消極，這些國家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依賴愈密切，則這些資產階級的力量將日益強大，終於會很容易丟棄那些『共產主義的』合作者，有如丟棄一只『榨乾了的檸檬』一樣。

問：如此說來，史大林黨在東歐的政策確實有問題。不過我想法國與東歐國家不同，那裏右派力量大，要組織單獨的工人政府，甚至清一色的共產黨政府都談不到，聯合政府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對不對？

答：也不對。我覺得恰恰在法國，史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犯了最大罪惡，其破產也最爲明顯。這幾天法國共產黨人正被『聯合政府』逐了出來，我們來談法國倒適得其時。戰後法國有許多地方與中國相似，只是他們組成了『聯合政府』，我們則失敗於將成之際。我們沒有組成，使許多人對『聯合政府』懷了更多的憧憬，更多的幻想，同時我們反對這政策的，也只得在純粹的論據上打圈子，得不到事實證明，這對於大多數人是不足以認識『聯合政府

』這個政策之錯誤的，在這方面，法國的成功經驗倒能幫助我們不少的忙。法國經驗能够告訴中國那些『聯合政府』的主張者：中國如果成立了『聯合政府』，結果最好也不過法國那樣。我們正可以從法國這面鏡子裏照自己。這次戰爭結束後，你知道，法國共產黨也是一個『武裝政黨』，牠背後跟着不少『抵抗派軍隊』。爲了對希特勒的仇恨，對維希派的厭惡，法國工人很自然地傾向了史大林黨，因爲『共產主義』，『蘇聯』，『十月革命』，這些名稱在一般勞苦羣衆看來，是由史大林主義者代表着的。他們把共產黨看成了戰爭，法西斯主義以及整個資本制度的反對物，解毒劑。他們在史大林主義者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得救，人類與社會的前途。這是難得的，對於初初覺醒，初初踏進到政治生活中來的勞苦羣衆，史大林主義的造成過程及其反動本質，是不能了解的。他們不能從思想與理論上研習此種複雜道理。他們祇能從實生活中，憑着經驗，逐漸認清史大林主義的口是心非，牠的言行不符，名實乖離。歷史上從來如此的，在羣衆左傾的初期，一些傳統的但已墮落的革命黨，往往能成爲廣大羣衆的趨附之所。此次法國的史大林黨也是如此。這時候，如果法國共產黨真是列寧主義的，採取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列寧的態度：與資產階級政派絕不調和，公然走上奪取政權的路綫，那末法國情形是極有利的。可惜法國史大林主義者早已不是這樣的黨了，牠早已深深中了妥協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毒，牠絕不能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了。所以，不管當時法國資產階級如何的虛弱無力，不管工人階級之傾向共產主義，以及小資產階

級之跟隨無產階級，是如何的激進，總之，不管這些進行堅決革命的順利條件存在，法共還是提出了『聯合政府』，希望和『抗戰』的資產階級共同統治國家。爲要取得這可能，竟致自動將『抵抗軍隊』解散，合併於『國軍』機構；竟致壓抑羣衆鬥爭，教工人們束緊肚皮，爲『國家的復興』而努力。這樣子，『聯合政府』成立了，『國家』（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的難關渡過了，資產階級政權給保存了，牠相當穩定下來了。自從希特勒崩潰到現在已經兩年，這中間，法國除了最初一個極短時期外，差不多全在『聯合政府』的統治之下，確切些說，全在共產黨，改良派的社會黨與資產階級的人民共和黨的聯合統治之下。在此時期中，法國社會諸階級的相互力量關係主要表現於這個聯絡內部，牠們是怎樣改變的呢？隨着時間的經過，人民共和黨的力量逐漸增強，改良派的社會黨迅速衰弱，而共產黨的力量則雖然增加了絕對數，但是減弱了相對量。這樣的趨勢一直發展到現在，終於資產階級經過了人民共和黨，復由牠經過了社會黨，將共產黨人從『聯合政府』中一脚踢出了。如此完結了（至少暫時中斷了）包含着共產黨人的『聯合政府』。

最近法國的閣潮表示了什麼呢？首先牠表示出法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相當恢復了，牠不再需要『聯合政府』。資產階級在不穩的時候接受了『聯合政府』，分幾席部長位置給『共產主義者』（事實上是從工人政黨手裏接受幾席部長位置），以此換得了『軍隊國家化』，換得了工人階級的効忠於『復興』，換得了資本制度的繼續生存；這個時候，他們在國內國外，幕前幕後，着着準備力量，積極佈置行動，等候到了現在，時機相當成熟了，他們配合了杜魯門的攻勢，戴高樂的活動，第一次開刀了。他們利用工資問題請『共產黨』人滾蛋。一切都符合於馬克思主義者的預斷，一切都重演了『一八四八年以來』關於『聯合政府』的老把戲！只是法國的『共產黨人』，乃至全世界的『共產黨人』，至今仍不能從此得出教訓，仍執迷地留在『聯合政府』的陷阱裏。

問：照你這樣說，法國共產黨的『聯合政府』政策，其錯誤與罪惡都是極顯然的，史大林乃至法共的領袖們何至於見不及此？如果見到，爲什麼明知故犯？這一點我還是不明白。

答：你這兩個問題，其實我在上面已經解答過了。歸根結蒂，不外乎兩點：（一）史大林爲了他的『一國社會主義』，其實是爲了他的那一個特權階級的自保利益，是寧願以任何方法與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妥協，不惜犧牲世界革命的道路；（二）二十年來走着階級合作道路，深刻地陷進了改良主義泥淖的一個政黨，即使在羣衆激劇左傾的時候，也不能改弦易轍，重回到革命道路上來了。史大林害怕帝國主義固然是事實，但他更害怕世界革命。史大林不是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之自覺的服務者，不是的，他也還要打倒帝國主義，在可能時候，也還要推翻資產階級。但由於蘇聯官僚層的特殊地位，特殊處境，養成了特殊作風與特殊心理。他們只相信從上而下的指揮，他們不相信羣衆革命的力量。這是因爲他們自己和工農大衆處於絕對相反的地位，害怕任何羣衆的直接行動。此外，官僚們的眼光是短視的，『現實的』，他們只着眼於今天可以聯合某一統治者去反對另一

些統治者，他們決不敢『冒一下險』。與革命的被統治者聯合，在今天或明天推翻所有的統治者。

問：我不十分滿意你的解釋。我認爲史大林所以要在法國做出『聯合政府』這個明知故犯的錯誤，不是爲了害怕世界革命，而是爲了害怕帝國主義，害怕美國帝國主義的借故實行軍事干涉，實行進攻蘇聯，所以我想，這主要還是爲了避免在目前這個不利時期與美國作戰，爲了不願冒險。

答：爲要證明出你這個設想的不對，我祇要指出下面這幾點就夠了：（一）美帝何時進行反蘇戰爭，主要係由牠國內因素：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佈置來決定，決不能因蘇聯的某一政策，或歐洲某一國的內政而隨時宣佈了；（二）一次戰爭剛剛結束，總是最不適宜於發動另一次大規模戰爭的，所以蘇聯即使採取革命路線，亦不會立即引起第三次大戰，恰恰相反，如果革命蔓延，會使帝國主義無法發動戰爭；（三）真正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要引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可是這個干涉力量，將來總比現在爲強；（四）如果史大林準備在蘇聯力量一經恢復，可以『幫助別國革命』之時，纔讓法國工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末這時候，法國工人不會響應的，因爲革命乃是一個國家內部矛盾的自然生長，不能隨時喚起。史大林目前以『聯合政府』斷送法國革命，將來也決不能在願意時候以『革命政策』來抵償的。

問：你這四點指出得很重要。不過我不相信法國共產黨人被人如此無禮地踢了出來，會仍舊迷信『聯合政府』辦法。事變也許會逼得他們革

命的。

問：至少照目前情形看，法共還沒有『覺悟』的樣子。在共產黨影響下的數百萬工人沒有起來爲工資的提高鬥爭，共產黨人在國內外都表示『繼續擁護政府』，一切都爲了不要『刺激』人民共和黨與社會黨右派，一切都爲了準備加入新的『聯合政府』。將來，法國政局如果更加右傾，人民共和黨，聯絡了社會黨右派，與戴高樂派合作來打擊共產黨的時候，法共會不會『革命』起來呢？我以爲不會的。法國可能發生分裂，甚至發生內戰，共產黨可能被迫拿起武器來對抗右派，但即使到那時候，他們的政治還不會是革命的，還一定要組織一個與『民主資產階級』相聯合的『聯合政府』。你不要以爲我這話說得武斷，你應該回憶一下我們剛才談過的，各國史大林黨之走到今日地步，乃是一個長期流血過渡的後果呀！這後果是不能隨便改變的。所以我可以斷定，今後法國共產黨無論採取什麼口號，也無論是什麼路，而在本質上，牠的作用總只能拉住工人階級，阻遏他們的攻勢，鎮壓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以此至少在客觀上幫助戴高樂派或其他的獨裁者上台；自然法國能有另一前途的，即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途，但要走上這條路，法國無產階級必須及時看清法共的欺騙，首先跳出『聯合政府』的陷阱，衝出他們的控制，在第四國際黨的領導之下，走向無產階級專政。這時候，法共多半會分裂，下層的多數參加革命，上層的少數依附反動。

問：你的話我無法反駁，但有一點我仍舊懷疑。如果法共再不能走革命的路，那末這次鬧潮的成因正爲了法共擁護工人增加工資要求，這將如

何解釋呢？

答：自然，法共現在還是主要以工人階級爲基礎的，牠不能不多多少少反映一點羣衆的要求。法共從來反對工資凍凍，現在忽然改變態度，這自然是法國工人更加左傾的表示。但這問題不在我們討論之內。我現在要說的，就是，一個政黨能多少反映基層要求是一回事，基層的左傾能否使一個徹底墮落的政黨重新革命則又是一回事。前者可能，而後者則不可能。就拿這次法國鬧潮來說吧。法共絕不會想要爲工資問題與資產階級破裂『聯合政府』，牠是要既不失歡於工人，而又維持『聯合政府』於不破的。結果，出乎牠始料之外，『聯合政府』破了，共產黨人於是妥協了，按捺住工人，『繼續支持』剩餘的『聯合政府』。法共的『左傾』僅僅爲要拉住工人階級的更左傾，使工人階級繼續信任『聯合政府』。

不過這些話是相當離了題的。從法國這次鬧潮中，我們首先應該得出來的教訓是：『聯合政府』這路綫，即使當作一個策略看，也是錯的。牠不能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走上政權，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替資產階級獲取一個喘息時機，使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癱瘓，因而使資產階級逐漸過渡到反動勝利。這次政潮又給了列寧關於『聯合政府』見解以一個新的例證。中國至今還迷戀於『聯合政府』辦法的人，應該從法國教訓中學得一些了。

問：關於『聯合政府』，我們從原則說到事實，從中國說到外國雖然不算怎麼詳盡，至少對於像我這樣的人，總已經足够了。經過了這次談話，我承認，我已經懂得了這個問題，明白了正統馬克思主義派對這問題所持態度。我承認史

大林黨在這問題上的立場是錯的，而你們第四國際一派，在這問題上的見解確實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傳統。

答：我很歡喜，我這粗疏的談話竟使你滿意。不過提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倒使我想起一件事來了。關於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應否參加資產階級政府，應否和資產階級合組政府，這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派中確實是有傳統的。當革命時期，社會主義者參加了資產階級代表合組的『革命政府』，正如列寧所說，自從一八四八年以來，就有好多次了，結果都是壞的。至於在和平時期，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去當部長，則以一九〇〇年法國一個社會主義者，名叫亞歷山大·米勒朗的爲第一次。因爲是新現象，所以立刻引起了當時整個第二國際的內部爭論。那時候，第二國際所屬的各國社會黨，業已經歷了深刻的機會主義墮落，所以討論結果，主張入閣的竟占了多數，保持着傳統革命見解的倒成了少數。所以從那時起，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中，不斷有社會主義者參加進去。等到第一次大戰後，此風更甚，麥唐納，樊迪文等都做起首相來了。不過真正的革命者，那些第二國際的左派，後來成爲第三國際創立人，再後來成爲第四國際派的，這個一脈相承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却始終忠於一九〇〇年巴黎大會的少數派決議，堅決反對『米勒朗主義』。爲了使我們這次反對『聯合政府』的談話更加充實起見，我想，把巴黎大會上的反『聯合政府』決議唸給你聽聽如何？

問：好極了，請你找出來給我看看：

答：反正文字不多，我索性將全文給你譯出來吧：

『巴黎大會關於『奪取社會政權』問題的

少數派決議：

『召開於巴黎之第五次國際大會，願提醒大家，奪取政權之意，應了解為對資本家階級在政治上之和平的或強制的剝奪。』

『如此了解的奪取政權，祇能讓我們占據那些由選舉產生的職位，黨應該利用自己的力量，即利用工人的力量，這些人組織在黨內，而黨則是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的。因此，大會不得不禁止社會主義者對資產階級政府的任何參加，社會主義者對於此種政府，應處於不斷的反對地位。』

問：這議案寫得很簡明，不過我覺得與你上次所談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仍有出入。牠雖然也提及以強制方式對資本家階級進行政治剝奪，但第二段意思很清楚，社會主義者要想奪取政權祇有靠選舉，而且，倘選舉給社會主義者保證了部分政權，他們還可以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府』的。

答：你真好眼力。這議案確實有你所說的兩個漏洞。而且這兩個漏洞，給了後來變節的社會主義者以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餘地。所以這個議案，反對公開叛變的米勒朗主義（即完全不憑羣衆直接行動的力量，就此接受資產階級政府的邀請而入閣的這個行爲），雖然有其革命意義，但由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這議案仍有其深刻的妥協性。歷史證明得太好了。議案的起草人，即當時的國際左派領袖尤爾·格德，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戰之時，竟會自己加入資產階級內閣的，他步了米勒朗的後塵。他之所以會這樣做，自然還有其他理由，不過根本上，他對資產階級政府未能採取徹頭徹尾的革命立場，犯着議案上你所指出的那兩個漏

洞，却也大有關係。惟有列寧一系，在『聯合政府』問題上採取了絕不調和的立場，在國家學說上完全信守着馬克思的革命傳統的，纔能免於墮落，並且完成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對資本家階級的政治剝奪』。這裏你看，革命理論與原則的力量，對於革命家的行動有多麼大的影響呀！同時你也可以看到，一個革命者，或一個革命黨，不管他或牠在今天或過去的行爲如何好，祇叫在政權問題上對資產階級有了妥

協傾向，那末遲早要墮落的，叛變的。尤爾·格德和他所領導的法國社會黨，在這方面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榜樣，近幾年來的各國共產黨又給了我們一個榜樣。話談得很多了，不過我們還不會把『聯合政府』問題說得詳盡無餘。還有許多可說的，例如與中國內戰相聯繫的『聯合政府』口號之遠景問題，等等。不過這些，讓我們將來有機會再談吧。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

是誰殺死了托洛次基？

蘭因

托洛次基，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在墨西哥，被一個名叫『傑克孫』的人所謀殺死了。本社出版的『托洛次基自傳』中附錄了『遇難始末』一文，對此謀殺事有詳細的記載。托洛次基被刺以後，未死以前，曾說：『傑克孫是格別烏人員或法西斯，多分是格別烏。』他死後，根據法庭調查的證據，以及整個謀殺事件底分析，已可斷定傑克孫是格別烏人員，即史大林派遣的兇手了。殺死托洛次基的，不是別人，正是史大林！

不僅全世界托洛次基主義者如此斷定，凡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是這般說的，連好多史大林主義者心裏也是這般說的，雖然說的是另外一套的話。

史大林主義者對於托洛次基之死是怎麼說的呢？他們說：這事與史大林，與格別烏，毫不相干；傑克孫本是第四國際黨員，本是托洛次基自己的信徒，祇因覺悟了受托洛次基欺騙，又不願執行托洛次基派他去蘇聯進行怠工和暗殺之命令，所以殺死托洛次基。史大林主義者這裏說的話，正是兇手衣袋中預藏的『供狀』內說的話。直到現在，將近七年，史大林主義者仍是這般說的。例如去年出版的『反蘇大陰謀』，這本格別烏的書中，就是持此論調。

史大林主義者不願格別烏起草的那個『供狀』如何自相矛盾，如何違反事實，仍舊堅持此論調。他們自恃沒有直接證據，便抹煞一切從案情做出的結論了。

可是，正如紐倫堡審判之摧毀莫斯科審判全部謊言一般，現在已經出現了直接證據，把史大林主義者對謀殺托洛次基一事所虛構的全部樓閣都摧毀無餘了。

這就是路易·布登斯（Louis Budenz）新著『這是我的故事』（紐約 Whittlesoy House 出版）一書暴露出來的關於托洛次基被謀殺之真相。

布登斯是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又是美國共產黨機關報『每日工人』底經理，在黨內地位是很高的。

但戰後，美國共產黨內部發生了派別鬥爭，或寧可說，史大林要撤換前任書記布勞德，而代以現任書記福勒斯特，以便把戰時政策錯誤歸罪於布勞德。布勞德是布勞德底左右手，他也跟着布勞德被史大林開除出黨了。被開除後，布勞德便投入天主教會內，向上帝懺悔，而且寫了這一部『這是我的故事』來暴露美國共產黨底秘密，亦即史大林底格別烏底秘密。謀殺托洛次基事，就是這些秘密當中的一件。

這件墨西哥城謀殺案原來是在美國紐約城準備起來的，美國共產黨領袖，連布登斯本人在內，都會幫助這件謀殺案之準備。據布登斯說，準備開始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即是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後和第二次莫斯科審判即將舉行以前。此時，史大林向挪威引渡托洛次基，未能成功，托洛次基得到墨西哥允許寄居，正從挪威乘船到墨西哥來。格別烏於托洛次基未曾在美洲登陸以前，就決定在美洲謀殺他了。

首先需要同美國托派接近，以便以後能够接近托洛次基本人。布登斯是美國共產黨內的『反托專家』，而且熟悉美國托派狀況，因為他曾是美國一個進步的團體『進步勞工行動會』領袖之一，一九三四年這團體和托派『美國共產主義同盟』合併，他反對這個合併，他在新黨之內與托派鬥爭，不久就退出新黨而加入美國共產黨了。一九三六年，這個新黨又加入美國社會黨內，為其中的左翼。格別烏既然決定謀殺托洛次基，便選中了布登斯，要他合作。布登斯書中說，共產黨另一個領袖史塔雪爾 (Jack Stachel) 介紹他去見格別烏負責『反托』責任的領袖，一個四十多歲的人，見面時除史塔雪爾外還有黨監察委員會一個委員。他們稱這個格別烏領袖叫做『朋友里却』，而且吩咐布登斯聽從他的命令，『凡他命令做的事，應比其他一切事情都先做的。』甚麼命令呢？布登斯說『里却』叫他搜集關於美國社會黨左派，即托派，底消息，搜集他們的照片，文件，住址，私人生活，尤其注意甚麼人會去國外旅行。布登斯很熱心地執行這些命令，因為他本是反托的，他現在還是反托的，他確信人家認錯托派一切的話。如此工作了幾個月長久。格別烏負責人調換了，『朋友里却』來代替了『朋友里却』，布登斯照樣工作下去。人家同他商議派甚麼人混入托派去做奸細，人家免去他的其餘職務，以便專心替格別烏做這工作。他每星期至少與格別烏領袖見面一次。

格別烏看中了一個托派女同志，雪爾維亞·阿哲洛夫 (Sylvia Ageloff)，因為她常在托洛次基家裏進出。布登斯說，一九三七年，有一天，『朋友里却』拿她的照片給他看，問他關於她的種種情形，同他商議如何去聯絡她。結果

，布登斯推荐他的女朋友『Y.小姐』來做這個聯絡工作。

『Y.小姐』是誰，我們早就知道了。她的真名是羅比·魏爾 (Ruby Weil)。她與布登斯同屬於『進步勞工行動會』，又與布登斯同時退出而加入美國共產黨，但她仍保持着與雪爾維亞·阿哲洛夫之友誼。布登斯介紹羅比，魏爾同『朋友里却』見面。這個格別烏領袖叫羅比同雪爾維亞親近。於是這兩個女人成了好朋友，一同到巴黎去旅行。在巴黎，羅比介紹了一個男子，名叫『佛郎克·傑克孫』的，同雪爾維亞認識。『傑克孫』『鍾情』於雪爾維亞，後來訂了婚，以此資格，這個兇手才能混進托洛次基屋內。羅比本人似乎事先不知道格別烏要撮合『傑克孫』和雪爾維亞之婚事，是爲了甚麼目的。因爲，據布登斯說，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一年，羅比帶肺病回到美國來，找到他，把全部故事都告訴他，而且說他不認識『傑克孫』，是到巴黎時一個格別烏人員，一個女人，介紹給她的，并且要她承認他本是她的朋友。布登斯說他當初不敢相信羅比底話。但無論如何，布登斯六年前就已知道這件謀殺案底真相了，他不肯說出來，今天他還有許多知道的事情不肯說，但他的書所已說出的也已足夠向我們證實一九四〇年謀殺案是格別烏一個領袖『羅勃』於一九三七年準備好基礎了的。

兇手『傑克孫』是格別烏人員，是史大林派遣的，——這件事，現在已有直接而無可否認的事實來證明了。

『這是我的故事』書中，除了暴露托洛次基謀殺案真相之外，還暴露格別烏其他的罪惡。

一九三七年，伊拿士·萊斯 (Ignace Reiss)，脫離了格別烏，而走到第四國際方面來，遂於瑞士被格別烏謀殺了；瑞士警察獲得了格別烏謀殺之確實證據，要求法國引渡兇手。全世界史大林主義報紙對此事件都保持沉默。布登斯書中說：這是格別烏命令。

一九三七年，美國共產黨一個領袖普印茨女士 (Poin) 在紐約城自己家裏很神祕地失蹤了。警察發現不到她蹤跡。無政府黨領袖嘉樂·特勒斯加 (Carlo Tessa) 向紐約大陪審法庭控告，說普印茨女士是格別烏綁去殺死的。布登斯書中說，美國共產黨政治局一個委員 H 同志告訴他：她 (普印茨) 已經被蘇聯秘密警察所『肅清』了。

一九四三年，上面說的無政府黨領袖特勒斯加，也在紐約街上被人開槍打死。兇手至今未曾捕獲。

布登斯這部書是今年三月間出版的，出版以後引起了震動，各黨派報紙都

有評論。美國共產黨機關報『每日工人』起初保持緘默，好久以後才寫了一篇書評，但是書評中完全討論天主教和共產主義問題，完全在布登斯信仰天主教一點上發揮議論，而絕口不提書中所暴露的種種格別烏罪惡。

三月十七日，老哲學家約翰·杜威，文學作家華勒爾，美國社會黨領袖諾曼·托馬士，紐約大學教授胡克，著名律師芬內雷，以及其他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共四十七人，簽名發表一篇宣言，并推舉四個代表，要求紐約法院檢

察官傳訊布勞德，史塔雪爾，布登斯，及其他過去的和現在的共產黨領袖，根據布登斯這本新書所暴露的種種事實，檢舉格別烏對於托洛次基，萊斯，普印茨，特勒斯加諸謀殺案的關係。檢察官答應認真考慮這個請求。

不久之前中國若干報紙登載四月二十九日法國新聞社從芝加哥發來的電報，說托洛次基夫人委託律師要求法庭傳訊史大林和布勞德，——這一定是布登斯新書引起的風潮之擴大。

國際鬥爭

托洛次基派在朝鮮

不久之前，有一個外國水手到朝鮮去，在那裏會見了『朝鮮國際主義共產黨』黨員。據說，這個黨是六年前從朝鮮共產黨分裂出來的。朝鮮現在一共有四個黨，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綱的，其中三個黨都是從共產黨分裂出來的，其餘一個就是朝鮮共產黨，但牠的路線并不符合於克臨靈宮底政策。

這個水手是托洛次基派，是第四國際黨員，發現談話對方底意見和自己很接近，於是雙方都很快活。朝鮮人引了水手到一個地方去，那裏約有三十幾個青年工人，其中有幾個能說英語。人們問水手好多問題，而且把水手說的話翻譯給不懂英語的人聽。從問話中知道，朝鮮托派僅僅得第四國際存在，卻不曉得近年來關於第四國際的種種消息。

第二日，朝鮮人又引水手到漢城郊外一個空貨棧去，那裏有許多工人和學生都有，在等待着。他們持有武器，而且在附近區域放步哨。貨棧內掛着紅旗，還掛一幅列寧像。人們都是坐在地毯上，沙發上鋪着鋼板做主席台。這日，羣衆提出了

如下幾個問題：蘇聯狀況怎樣？蒂托做什麼事情？第四國際贊助英國工黨政府麼？日本有我們的同志麼？『美國勞工聯盟』和『產業組織大會』有什麼不同？美國兵爲什麼這樣落後？等等。

羣衆同意水手關於蘇聯的分析。據他們說，除了他們這一黨以外，朝鮮還有其他黨派或團體同意第四國際底主張，好多黨派或團體現在還是以領袖爲中心或以地方爲單位組織起來的，相互間的聯絡很困難，但并非不可能。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把這些同意第四國際的黨派，在第四國際綱領之下組織起來。

有幾個人是從北緯三十八度以北的蘇軍佔領區逃到美國佔領區來的，他們說了俄國人許多搶劫和謀殺的可怕故事。常常有整個鄉村整個城市底物資都被俄國人搬光了。

美國軍隊在朝鮮也常常逮捕工會領袖，破壞工人罷工。朝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則擁護美國政府。金九公然號召朝鮮人擁護美國軍隊反對俄國軍隊。他的信從者有許多人離開了他，而參加馬克思主義運動。除了共產黨以外，工人黨派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都不參加美國人所佈置的『選舉』。漢城工人曾經示威反對共產黨候選人，這些人恭維此次選舉，說這是『霍奇將軍底真正民主措施』。工人強迫共產黨候選人退出選舉，而且強迫若干當選的民族主義者放棄所獲的位置。議會中祇有三

十個人是選舉的，其他三十個人則是霍奇將軍所任命的。霍奇將軍還任命一個總督或總統，這個『政府領袖』還享有完全的否決權，對於一切問題。據朝鮮托派告訴水手，在朝鮮，祇有大地主和工廠主及若干商人擁護這個政府。（盛）

駐防東歐的蘇聯軍隊逃亡了很多

蘇聯軍隊中逃亡的風氣非常盛行。據三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訪員克拉克所估計，逃兵數量竟佔據全軍隊百分之十。德國默克倫堡邦東部有個集中營，其中就監禁了七千被捕獲的逃兵，未捕獲的逃兵人數更多，他們流浪在德國東部，波蘭，巴爾幹一帶，有一部分人上山做土匪。克拉克寫道：『據說，俄國佔領軍換防時間，現在比以前更短促了，兵士們常常在德國服務三四個月，就須調回俄國去。佔領軍如此勤於換防，一般人認爲是蘇聯當局不願意兵士太過於長久受國外生活所誘惑，以致有可能傳染了非共產主義的思想。去年十一月底，俄國軍隊有一次大換防，大部分兵士調回國去，鐵路和公路忙於運輸兵士，但此時逃亡得也最多，因爲他們不願回到俄國去過艱苦的生活。』

蘇聯法律懲罰逃兵是很嚴厲的，逃兵捕回來的，要被判派到西比利亞荒涼區域去做苦工。現在蘇聯軍隊駐防的地方，德國東部，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等等，一般生活本不很好，經過戰爭破壞之

後，更加不堪。但現在竟有許多兵士，不怕嚴厲的法律，而留戀於這些國家底生活，不肯回蘇聯去，——於此可見史大林統治的蘇聯生活是如何艱苦的了。(盛)

日本戰俘不肯被人利用去破壞罷工

今年初，馬來羣島巴都阿蘭地方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資本案拒絕了工人要求，政府幫資本家忙，說要派日本戰俘代替工人做工。工人不肯屈服，於是政府實行他的恐嚇了。但是日本戰俘在礦山工作故意做得慢，表示他們並非自願來這裏破壞工人罷工。由此，工人對於日本戰俘發生了好感。馬來『早晨論壇』報二月十五日社論指出：『這是戰後第一次，馬來人民和日本戰俘中間表示了利害一致，後者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是被前者視為最可惡的壓迫者的。』英國政府看見這個情形，恐慌起來了。政府發言人湯浦生趕快提醒馬來工人，不要忘記那些『野蠻的敵兵』。(盛)

印度托派為印度共產黨受迫害事

向政府抗議

今年一月間，印度警察同時搜查印度共產黨各地黨部及重要分子住宅，而且捕去了好多人。據說，這是因為六個月以前印度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時代』曾有一篇文章洩露了印度政府某些秘密的軍事計劃。但事實上，這不過是印度政府走向壓迫羣衆運動道路去的第一步罷了。政府所以先拿共產黨來開刀，那是因為在一切黨派中共產黨是最不受民衆擁護的。我們還記得，在此次大戰中，惟有共產黨

擁護戰爭，而且反對一九四二年八月間羣衆反帝國主義的暴動。

印度布爾雪維克列寧黨，第四國際支部，特爲此事發表了一篇宣言，其中表明他們雖然在政見上與共產黨有不可和解的歧異，但仍舊站在共產黨方面抗議此次搜查和拘捕。宣言警告印度民衆，說此次警察行爲不僅有關於共產黨一黨，而且有關於全印民衆，因爲這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分子三方面聯合向公民自由和羣衆運動進攻之第一步。宣言又號召一切左傾組織結成聯合戰線來保衛公民自由和羣衆運動。

政府領袖尼赫魯聲明，此次搜查和拘捕并未會得到政府諸閣員底允准，諸閣員事先還不知道。托派宣言指出尼赫魯這話是無人肯信的。此次事件應由他及其他閣員負責。但即使退一步說，尼赫魯說的是實話，那麼托派底分析和預言更加證明是正確的，因爲托派曾經說：在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中的國民大會黨諸閣員，不過替英國帝國主義裝門面罷了，英國帝國主義者在這個門面背後做着他們以前做的事情。

印度托派很活動，若干重要工會是他們領導的，有幾次示威遊行也在他們主持之下。

在錫蘭島上，有兩個托派組織，一個就是『印度布爾雪維克列寧黨』底錫蘭支部，另一個是當地的『蘭加散馬散馬雅黨』(Lan & Sama Saraja Party)。現在這兩個組織已經統一起來了。最近這個統一的錫蘭島組織參加了錫蘭島行將舉行的議會選舉，提出了三十名候選人，以散馬拉科狄(Samarakotiy)同志爲首。這人曾因反對戰爭被捕，關在牢內，會從監獄中逃出來，仍留在錫蘭島秘密進行工作，後來又被捕，而且爲越獄事被判六個月苦役刑，到戰爭終止後，他才恢復自由。

美國托派統一進行順利

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和工人黨，自從決定統一以來，雙方組織開了好幾次聯合會議，三月十一日的會議通過了一篇聯合宣言，由社會主義工黨總書記加農和工人黨總書記沙克曼兩人簽字發表。宣言開始說：『一九四〇年社會主義工黨發生了一次內部鬥爭，結果造成了分裂。少數派組織了一個獨立的工人黨。這分裂一直繼續到現在。』接着說起戰後恢復統一之嘗試未能成功的經過。以後就說此次雙方約定的統一基礎：工人黨答應參加今年秋天召開的『非常大會』，願意接受這個大會底一切決議，社會主義工黨則答應工人黨有權參加大會前的討論，并依照人數比例派遣代表參加大會。現在兩黨已共同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爲了計劃雙方合作，領導共同的對外鬥爭，并準備正式統一之實現。(盛)

越南政府感謝美國托派幫助

一月二十五日，美國托派兩個組織，『社會主義工黨』和『工人黨』，會於紐約法國領事館門前舉行示威，要求法國退出越南，要求美國勿以軍火供給法國。此事，本刊上期已有記載了。二月十五日，越南政府國務副卿 P. N. Thach 博士，特代表越南政府致函向那兩黨申謝。函中說：『你們在紐約舉行的大示威，贊助越南獨立鬥爭，我們知道了深深的感動。現在，我代表胡志明總統和越南共和國政府向你們和你們的團體深致謝意。他方面，越南總工會也請我向你們和你們的團體致最熱烈的敬意和感謝。這是第一次，美國民衆公開贊助我們現在的鬥爭。我們希望，經過你們的活動，美國進步的團體將送給我們以武器，軍需和醫藥，爲了幫助我們將法國帝國主義逐出越南之外。』(盛)